

三味书屋

历史视野与家乡观念

——《他者中的华人：中国近现代移民史》带来的启示

王 辉

本人的学术兴趣，主要是从事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。近日读了孔飞力《他者中的华人：中国近现代移民史》，发觉这本书虽为历史著作，但其由古及今的历史视野，对中国人家乡观念的深切关注，对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有很多的启示意义。无独有偶，本人在201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《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》的前言部分，就专门谈及历史与家乡问题，后生小辈如



我者与一代国际汉学大家孔飞力的观点竟不谋而合，所以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不禁有“六经注我”和“我注六经”之感。

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，研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问题，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显学。然而，一者由于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、经济学、人口学、政治学等领域，二者社会科学本身主要是关注当下的经验现实，所以纵观当前流动人口研究现状，绝大多数是就当下说当下，缺乏历史的视野。

在《他者中的华人》中，孔飞力主要的精力是研究历史流动与跨国流动，即研究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及欧美历史，但是，宏观的大历史视野，使得孔飞力将视野上溯到晚明时期，向下触及作者成书的2008年。所以，孔飞力在这本书中也隆重提及了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。由此可见，宏观的视野与渊博学识，使得孔飞力能够“通古今之变”。

孔飞力的研究证明，其一，历史学而不仅仅是社会学，也可以介入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领域；其二，当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，必须基于现代化史的角度，再也

不能就当下说当下。

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的经验与现象，但是，历史学又不能不关注影响人类社会行动的终极性的思想观念。而家乡观念——从情感、风俗、组织、文化角度而言，都是影响中国人包括现代移民运动的终极理念。在过去，中国人关注社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文学和哲学，而家乡则是文学和哲学最为关注的命题。

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科学正式兴起，并取代了文学和哲学而承担起研究社会的重任之后，就将依然存在的家乡问题也一并抛弃了。当今研究流动人口的学者也照样对此忽略不见，偶有提及还将其置于犯罪和破坏社会稳定语境之中。

导致这一学术现状的原因，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人身在此山中的文化局限，而西方学者反而对这种“他文化”的显著特征非常敏感。像研究晚清民国移民史的国外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、顾德曼在《家乡、城市与国家》、韩起澜在《苏北人在上海》中，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全部内容，旨在说明家乡情结对移民的经济行为与政治行动的影响。孔飞力在《他者中的华人》里也同样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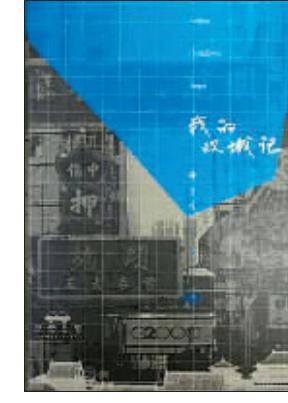
此作了深切的关注，例如华人的移民渠道、职业、方言、同乡组织、社区生活、衣锦还乡的梦想，以及家乡观念与民族主义、国家观念的联系与区别。

另外，关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国民性，历来是国内学界的一致共识，但是孔飞力却对此提出了质疑。他认为，只要政策许可或者在生存环境存在落差的“推拉”情况下，中国人并不总是固守本土、老死乡里，而是选择奔赴他乡，另谋出路，正如民谚所谓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又所谓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是也。

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孔飞力的另一种解释。他认为，中国人的家乡情结，并不仅限于空间地域和血缘群体上的“在一起”，还包括与家乡及亲人“保持联系”的感觉；中国人的迁徙并不意味着与家乡和亲人的本质分离，而只是表明这种联系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展而已。这一观点非常新颖，如果以此来观照当代中国流动人口，便会发现由于交通、通信工具（手机和网络）的发展，他们与家乡“在一起”的方式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，且新的方式让他们在加快融入流入地的同时，又加深了与家乡的联系。

荐书

《我的双城记》



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作者 | 贾葭 |
| 出版 | 三联书店 |
| 日期 | 2016年1月 |

写时事及文化类专栏文章。本书是他为多家报刊写的专栏的合集，分《京城风物略》《北京欢迎你吗？》《亲爱的大妈》《满城尽是潜水艇》等七辑，共辑录100多篇文章。这些文章，既能让读者有强烈的代入感，在阅读中感知各地风物，又能让读者领略跳跃的语言带来的文字爽利之美。如《做美国人的爹》：“……北京人民就更方便了；卖房，移民。反正北京在中央，底下总有从山西或浙江来接盘的。现在，拜高房价所赐，北京人民也有机会享受洁净空气与靠谱的子女教育。生是中国人的人，死是美国的死人，不含糊。”这聊的是移民问题；《不上网，毋宁死》说的是公共网络使用问题；《人人都是时评家》说的是北京出租车司机侃大山的趣闻。

这是一部充满趣味性的书，每一篇文章以小见大，短小精悍，可读性强。读贾葭这部作品，不由人想起他书中提到的另一位专栏作家李海鹏，李海鹏的《佛祖在一号线》与此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（推荐书友：南茶）

《罗茜计划》



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作者 | 格雷姆·辛浦生 |
| 出版 | 湖南文艺出版社 |
| 日期 | 2016年4月 |

他设置了苛刻的条件，寻妻计划的成功率可想而知。这时女主人公出现了，她抽烟，做事没有清晰的规划，吃东西不注重营养卫生，可以说她是完全背离了唐对未来一半的设想，连筛选“面试”的机会都没有。但在好友的安排之下，从第一次酒店吃饭到后来的寻父行动，男女主人公不知不觉中由“事故”发展成了“故事”。

作为一名科学家，唐一直用自己严谨的科学推论，告诉自己他俩不可能，但潜意识中，他其实想是想与罗茜建立起某种恋爱关系，只不过他到最后才觉醒。原因很简单，唐是一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，因为幼时的一些糟糕经历，他患有社交障碍。而罗茜是一名心理学的博士生，其实她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唐的问题所在，她在不断地帮助唐认识自我、改变自我。而唐在帮助罗茜寻找生父的过程中，也在不断地帮她建立信心，寻找爱和安全。

作者用简单的一个寻妻计划，修复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疾病，这其中当然有专业技能引导的作用，但更多的还是爱。

（推荐书友：金永森）

从“一个人”到“一棵树”

——读韩江《素食主义者》

徐巧琼

一个人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会把自己当成一棵树——合上《素食主义者》这本书，脑中突然跳出了这样的想法。

韩江的《素食主义者》，不厚，才200页，但封面上，却如数家珍般地摆出了“李箱文学奖”“韩国小说文学奖”等各种奖项。我估摸着，等到再版时，还会加上一个：布克国际文学奖——2016年5月16日，它获得了本年度的国际布克奖。

《素食主义者》由“素食者”“蒙古斑”“树火”三部分组成，分别通过女主人公丈夫、姐夫、姐姐的视角，勾勒了一个拒绝肉食与暴力的女性。全书情节紧凑、笔端蕴秀，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疯狂和伤痕仿佛触目可见。照评委会主席Body Tonkin的话说，这是一部简洁、精致又令人心慌意乱的小说，它将在读者心里甚至梦中盘旋不去。

主人公英惠的遭遇正缘于一个梦。某个早晨，她从梦中醒来，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素食主义者：她厌恶杀戮，拒绝吃肉，拒绝为家人准备荤菜，甚至到最后，她拒绝自己的“人类”身份。她把自己当成了一棵树，一棵只需光和水、谢绝任何食物及交流的树。

英惠的这一举动，在她守旧的家庭里掀起风波。丈夫为此与她离婚，伤透了心的父母不愿与她相见，还有姐夫那隐私而疯狂的欲望……最后，她被送进精神病医院。作为唯一看护她的姐姐仁惠，背负着痛苦与压抑，用重重忍耐，包裹着生活继续前行，也见证着英惠无常的人生变数。

为什么英惠会变成现在这样子？为什么？

在英惠的丈夫“郑先生”的眼中，“病”前的英惠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；不高不矮的个头，不长不短的头发，相貌平平，着装一般。正如“郑先生”所希望的那样，英惠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——料理

家务，伺候丈夫，就像千千万万的传统韩国妇女一样。但是，为什么英惠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呢？为什么？

仁惠一直在纠结。在医院里，仁惠冲着英惠喊：“你真的要这么死去吗？不会真的这么想吧？即使真的想变成树木，也要吃东西啊，吃东西才能维持生命啊！”

英惠把脸转过来，像望着陌生人似地凝视着姐姐，说道：“……为什么不能死掉呢？”这是英惠变成“树木”前，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仁惠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一天，姐妹俩在山里迷了路，当时只有九岁的英惠对她说：“我们索性不要回去吧。”那时，仁惠无法理解那句话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她才懂得了妹妹：小时候，父亲的暴力只冲向英惠，因为温顺而一根筋的英惠，不会看父亲的脸色行事，只能默默地咽下所有的苦水。即使面对成年的英惠，暴躁的父亲也是动辄拳脚相加。

在英惠病后，结婚五年的丈夫就像

丢弃废物那样，若无其事地抛弃了她……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英惠才想要变成一棵树，远离人性黑暗面，远离人类世界。

“我想通过《素食者》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。”在领奖台上，身为女性的韩江如是说。

作为韩国人，韩江很清楚当代女性的地位，韩国曾是亚洲最严格的父权制国家，即便是当下，出现了朴槿惠这样的女总统，也并不代表女性地位得到多大提高。“规矩”“卑微”仍是韩国妇女的身份标签，婚后“相夫教子”的主流观念，使得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无处施展能力，最终离开职场，成为“十项全能”的小媳妇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出现“英惠式”的压抑、疯狂和叛逆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读完这本书，我的双眼定格在小说结尾：有一只像秃鹫模样的黑鸟，正展翅冲向天空中的乌云处。

也许，英惠就是那只试图冲出乌云的黑鸟。

书人茶座

瞧，他们的文学与爱情

方其军

杨绛先生辞世的那几天，传媒空间对先生的追悼蔚然成风。作为一个百岁老人的告别，人们内心激活的是对存储百年民族文化记忆的“活档案”的眷恋。对于杨绛先生的追思，人们或许更多的是关注她既珍重又淡然的人生境界，以及她与钱钟书先生的旷世爱情。有一种说法，钱钟书写《围城》的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为给杨绛解闷用的。《围城》写于1944年至1946年，那时候，他们困居于沦陷的上海，守在家里难免无聊，钱钟书就写《围城》，写一段给杨绛看，写一段给杨绛看，增添生活的乐趣。这就不难理解，《围城》为何写得那么幽默了。

在这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钱钟书来过宁波。1939年秋，钱钟书自上海赴湖南出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，取道宁波。“抵渐之鄞县，及诞登上，自奉化之西溪口，走嵊县、长乐、永康、金华……经三省五千里，历一月又四日，路非不远，时非不久也。”他留有诗作《游雪窦山》：“兹山未识名，目眺心颇许。入门送眉青，犹湿昨宵雨……”

现代文学史上，渐欲迷人眼”。徐志摩与陆小曼、萧红与萧军、郁达夫与王映霞、胡兰成与张爱玲……民国时期的许多诗人作家，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并非“一以贯之”，那些往事如今倒成为人们回望那个年代的别样

风景。而另一些长情的诗人作家，他们的坚贞爱情与和美婚姻，直让人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。这样的作家夫妇，除钱钟书与杨绛外，还有巴金与萧珊、冰心与吴文藻、沈从文与张兆和……

巴金与萧珊的爱情，由长篇小说《家》见证。巴金写作《家》时，应该没想过他会因为这部小说而成了宁波人的女婿。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《家》单行本后，巴金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追捧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宁波鄞县（现鄞州区）人萧珊，就是其中之一。1936年，萧珊还是高中生，读了《家》后热切地给巴金写信，巴金给她回信。书信往来半年多，萧珊主动给巴金去照片，说：“笔谈如此和谐，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？”然后，两人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，相谈相欢。

结识后，两人又经历八年恋爱。1944年5月初，41岁的巴金与小其13岁的萧珊在贵阳旅游结婚。巴金回忆说：“只印发了一个通知，没有摆过一桌酒席……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。”可以说，他们是“裸婚”。萧珊逝世于1972年，28年里，无论世事如何坎坷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、相互关怀。

人与人的相识，回忆起来都是缘，尽管形式各有不同。冰心与吴文藻的相识，颇具“偶然性”，而相识后的交心，则与拜伦、雪莱等英国诗人的作品有关。1923年8月17日，邮

两情相悦不同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，是以沈从文的苦恋开始的。

1929年，沈从文被胡适聘请到吴淞中国公学当老师。在校园里，学生张兆和的美丽容貌和高雅气质让他一见倾心，便悄悄给她写起了情书。她只是沉默。后来，学校里不知怎么起了风言风语，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。那是1930年7月，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他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，说：“老师老对我这样子”。胡适答：“他非常顽固地爱你。”张兆和说：“我很顽固地不爱他。”胡适说：“我跟你爸爸说说，做个媒。”张兆和连忙说：“不要去讲，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。”

胡适竟然支持这份“师生恋”，张兆和只好听任沈从文的“狂轰滥炸”。在沈从文锲而不舍地追求之下，张兆和开始动摇：“我虽不觉得他可爱，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。”1931年，两人关系开始密切，沈从文逐渐创作《边城》《湘行散记》等。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，无一例外皮肤黝黑、相貌清秀，而这种相貌的原型，便是张兆和。特别是小说《三三》，凝结和昭示了一生情缘。

1933年9月9日，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，但没有举行仪式。沈从文说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
中国声音



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作者 | 胡鞍钢 |
| 出版 | 东方出版中心 |
| 日期 | 2016年5月 |

的民主到底是怎样的情况；腐败问题是否引起政府的重视……这些问题都是外国专家所关注的，而如果连专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，那些普通的外国民众肯定就更加模糊不清。一些揣测、想象甚至是居心叵测的谣言，在对中国现实情况不了解的外国人中大有市场，给中国带来负面的国际影响。作为研究中国国情的资深教授，胡鞍钢讲述中国故事，是以非官方的角色在与外国媒介专家对话，他的发声更有说服力和公信力。

对于来自各方的问题，如何在主动沟通的基础上，运用好战略沟通、学术沟通和媒体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好在胡鞍钢教授身经百战深谙“三通”之道，在《中国声音》这本书中就有确切的体现。阅读本书，读者不仅可以从宏观视角、顶层设计、未来走向来看中国的远景，更能知道外国对中国关注的焦点、热点与疑点。这正如一片叶子的两面，各有奥妙乾坤，却是钟情于政治经济的读者想要知道的答案。

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